

公共生活 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 约翰·基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约翰·基恩 著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8号

John Keane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约翰·基恩 著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开 9.875印张 255千字

印数 0001—1600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26-7/D·74 定价: 6.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论文一 官僚主义及其不满：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	(11)
论文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	(37)
论文三 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晚期资本主理论的发展…	(85)
论文四 技术与实践：哈贝马斯早期所恢复的政治概念…	(137)
论文五 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组成部分.....	(171)
论文六 资本主义和创造性的破坏.....	(225)
论文七 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权力、合法性和现代契约 论的命运.....	(265)

绪 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由于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必定要同时并进，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大大地暗淡了。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这种教条最有影响的样板，这种样板被用来为各种新式的官僚主义统治辩护，同时妨碍各种民主自治理论的更新。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卫民主其实就是为赢得对官僚主义国家机构的控制而斗争；利用这些机构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指挥能力；从而减少或取消私人资本的权力及其应负责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倾向无疑把国家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消亡”看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然而，政治权力暂时还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为了保护这些成就和未来的变革，防止“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报复行动，国家权力还是需要的。在反对这些抗拒分子时，官僚主义的国家会变成存在之物的临时保管人。国家通过保证投资、减少失业和扩大社会保险项目的再分配使自己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保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公正和平等。于是，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不受限制的生产和大量福利事业的时代便开始了。

这种预测认为，一种比较“民主的”秩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不仅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政策。由于负责实现民主的“均衡模式”(麦克弗森语)，即接受传统的选择机制和有权威的政府——这些机制如保证政党精英之间的竞争的定期选举、法治和立法机构独立等，国家便可以强化以民主名义实行的财产关系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

深信这些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设想社会群体不会独立自主地作出政治判断；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扮演被动的公民角色，宁愿选择政治上的精英人物，后者则依靠争取选票获得决定权。这种统治主义的均衡民主模式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模式；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过分自信的观点，通过逐步扩大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网络就可以分期建成合作的和民主的社会。

在这种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假设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程度。很不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和多元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和整个集体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决定都是由集体所有成员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那么，从某种规范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使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和倒退的）变化。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从前被公认是限制滥用职权的主要手段的民主，现在却变成了无自由权状态的伙伴，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

这里以一种简略方式描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假设。然而，关于这些假设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 and 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却不能丝毫怀疑。从它自己的政党组织圈子到它已经占领和扩大的国家机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大大地加快了当代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它促成了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分化，给个人和群体贴上了标签并加以限制，通过官僚主义的专业技巧强化了调节和安排生活的一整套制度。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自相矛盾之外；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很快地不再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减退和变化以及关于国家官僚政治的争论所带来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保证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时代的目标比它的鼓吹者迄今

所设想的更难达到，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

这至少是本书收集的这几篇论文的出发点。论文以突出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促进官僚主义化倾向的形式出现，这些论文确信，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根据这些论文的观点，只要两个以上原先单独行动的个人聚集在一起探讨他们自己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已经和始终置身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一个公共领域便形成了。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结合，公共领域的成员们考虑要做什么，确定他们将如何在一起生活，推定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的估计限度内如何才能可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集体行动。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永远取消这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会象中世纪的农民失去公共土地一样引起严重的后果。支持这种信念的论据大部分来自20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的传统，尤其是马克斯·韦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克劳斯·奥夫的著作，而这些论据又被三个互相联系的论点联系在一起。本书非常扼要地概括了这些论点。把这些论点放在一起考虑，可以被看成是对更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贡献。

按照本书所介绍的第一个论点，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在晚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尤其是在它的北大西洋中心地带，例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官僚主义的合理性倾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些国家里，对人的管理会让位于对物的管理这个19世纪的希望正在得到实现，尽管是以一种完全颠倒了和伪劣的形式。不仅是物，而且连人本身也都在受到形式繁多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管理和控制。这种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不仅限于工厂里劳资关系的变化。资本控制工资劳动者只是更广泛的和高度复杂的官僚主义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点的反证是，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不仅限于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机构已经到了越来越取决于它的运转方式的地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

约翰·格雷和J.S.穆勒等人首先提出的官僚主义就是由政府官员来管理的各种依据，现在都必须加以修改；**官僚主义**这个词再也不能被用来仅仅说明国家决策和管理过程的特点了。

相反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消除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区别还没有成为现实；例如，由于资本家和国家官僚机构之间的一贯对立。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趋向于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社会机构和国家机构正在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正象希法亭等人早就指出过的，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是由“天生”自由的个人和遏止国家权力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盛行于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从入狱、交往和卫生到生产、教育、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这个论点的引导下，本书这些论文把注意力引向大多数现代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如何变得象学校、医院和监狱一样，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如何力求规定，监督和控制生活、卫生和死亡。据观察，在大众传播领域里，电台、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新闻机构的领导人都在谋求严格规定供他们的公众消化的文化的类型和数量。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监督和纪律甚至可以把影响扩大到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

因此，正确的理解是，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威胁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其结果是，各种官僚机构正在使自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圈子，看来谁也不允许离开这个圈子。

这个包围的过程当然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保证合法地管理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的倾向。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二个论点是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据认为，所有官僚主义机构都倾向于对特权、任务和责任作出差别很大的安排，其基本组织原则之一是非政治化。这个论点完全不考虑自由主义理

论的悠久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官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是由国家官员倾向于废除均衡民主的目的和方法而产生的。这种假设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官僚机构现在是靠受控制和盲目服从的国民兴旺起来的，他们承认正常状态和官僚主义支配和服从关系的必要性。公私官僚机构寄希望于它们逐步造成的非政治化，当然力求把它们的根子深深地扎进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去。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逐步变成日常工作机构。日常生活受到等级制机构网络的普遍影响，这些机构都由领导人、专业人员和专家顾问来管理，每一个机构都雇用法律顾问、保安人员和宣传人员，每一个机构都力图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变成争取达到这个机构的目标的可靠工具。根据这第二个论点，这就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官僚谋求在没有自下而上的讨论和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各种决定。有关机构的形式及其目标问题，倾向于通过命令主义的和形式上是合理的手段来决定。无论什么地方官僚主义机构都不仅依靠对声望和权威的崇拜——这是一切寡头统治的一个特点，官僚统治是寡头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对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专业化管理使这些领域成为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非政治化对象的愿望。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从理论上为这种官僚主义从属关系的过程所进行的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已经尽人皆知。同时，可以认为，为非政治化所进行的这些辩护已经产生了类似“形而上学的夸张”（古尔德纳）的东西，这就是说，加强了无法逃避官僚主义命令的宿命论思想。本书的这些论文批判地讨论了这种夸张的许多例子：民主的“均衡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安全状态；公共生活概念的“重新封建化”；官方对“管理”居民的关心；传统的政治概念和早期自由主义合法权力理论的退化；最后是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论述的兴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非政治化“思想体系”大部分来自马克斯·韦伯。当然，把韦伯的观点包括在围绕着官僚主义统治

的形而上学夸张之内，乍看起来似乎是苛刻的和令人误解的，因为他是打算驳斥无条件地盲目崇拜官僚主义的。他坚持认为，并非所有的活动和事情都能通过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规定和控制；抽象的和精打细算的官僚主义机构压制各种特殊的需要和活动，并且有步骤地引起政治目的感的丧失。不过，这些机构在技术上的优势保证了它们的不断扩张，这是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是不可缺少的进步。他断定，在当代的条件下，放弃争取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被动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

根据本书这些论文的观点，这个结论是很不令人信服的。韦伯为官僚主义的必要性所作的辩护有几个致命的弱点。这里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其中的两个，因为这两个弱点合起来不能不导致这样的结论：韦伯显然不能证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抵制官僚主义统治的“预期进展”。首先，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主义机构在技术上和行政管理上的熟练程度；他因此而低估了这些机构破坏它们自己要求有效地和按照专业的、表面上合理的规则履行职责的一贯倾向。第二个弱点是：韦伯没有分析官僚机构规定、管理一切现实并使之非政治化的愿望如何有步骤地妨碍维护其下属机构的纪律。韦伯还毫不犹豫地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都是一种副业；他因此而严重地低估了官僚机构可能催化保卫独立自主民主讨论原则的权力斗争的程度。

对韦伯的这些指责是指导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三个论点的前提。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行政管理的“没有生命的机构”不断地引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要求。在当代，民主的公众自由到处都被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所控制，这当然是事实；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落入官僚主义奴役怀抱中的全体居民被要求心甘情愿地崇拜或暗地里诅咒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行政管理、传播媒介和战争的人。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在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内部或相互之间不可能协调一致；这些机构的霸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奏效，而是依靠在行政管理上不断地玩弄

花招和重新适应各种独立自主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对普遍地轻视公共生活表示惋惜往往是为时过早和夸张，因为任何地方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都倾向于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正象卢卡奇在反对韦伯时首先坚持认为的那样），而且成为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各种斗争的对象。这些斗争影响了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不断调整，而且增加了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得到发展的条件。这些反抗直接与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倡的统制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相矛盾。可以说，这些反抗在反对这种模式时也有晚期资本主义秩序所不能痛快地满足的新的需要和期望：对社会和国家范围内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

本书这些论文在为这第三个论点——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辩护时举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首先，某些薄弱环节、计划失误和其他不均衡状态都是由于公私机构不能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协调彼此的关系所引起的。正象奥夫和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见论文三），在和其他官僚机构一起行动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断压力下，官僚主义的精英人物通常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原则上拒绝在非正式基础上办事的做法。这些精英人物想通过非个人的和技术上成熟的运转规则治理他们的环境的愿望，与尽力乞求其他官僚机构和反对派运动合作——例如通过阶级合作性质的决策办法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是矛盾的。其次，这种对官僚主义试图保证使全体居民非政治化的打算的横向限制，由于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类似困难而倾向于加强。这些机构试图悄悄地履行它们的职责而“不考虑特殊的人和环境”（韦伯语），与它们有邀请其本身的成员参与的义务是矛盾的。这种邀请过程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机构”不论什么时候都至少要依靠其成员的最低限度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官僚机构的非个性化运转方式不断地使其成员疏远并引起他们的积极反抗。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动态经常打断它们变成日常工作机构的趋势。官僚主义的权

力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始终是脆弱的中介以及为信用和权力分配而斗争的结果。按一种自相矛盾的组织原则——非政治化——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地被迫邀请其成员和委托人积极参与，同时又压制他们的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公共领域——集合在一起的国民在其中发表意见、相互影响和独立自主地决定行动的方针——是各种官僚主义权力范围内不间断的、虽然不是故意的虚假相互承认过程的产物。国家和大公司机构必然不断地促使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变成仅仅是行政管理的对象。它们往往还由于假装接受通过争论、公开讨论、妥协和取得一致意见的办法调解利害冲突的原则，激发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需求。大公司和国家的各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所遇到的麻烦的基本根源是，它们必须保证得到其成员和委托人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支持——同时又不引起他们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干预。

这种纪律和参与的辩证法的各种实例在本书这些论文中分析：福利国家试图通过使“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和控制”战略非政治化来满足各种社会要求（论文一），通过传播媒介鼓动和控制舆论（论文三和五），通过各种参与的办法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合理化（论文六），等等。这些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里所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正确的，即官僚主义机构既压制又鼓励独立自主的公众的成长，言下之意是增加使国家和大公司机构受到自下而上的检查、改造和监督的可能性。

这种民主的可能性当然引起对新问题和旧疑虑的反思，本书这些论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和疑虑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论文四提出了一些关于（青年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等人）通过恢复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和实践的区别来批判官僚主义合理性的尝试的局限性问题的重新解释，在论文六中有助于把某些考虑集中在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和当代各种科技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上。最后，两篇论文（一和七）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公

公共领域的机构形式。无可否认，这两篇论文的结论还是初步的，但是它们指出，为保卫公共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不等于自发地取得一致意见的愿望，仿佛民主的社会主义不知何故能够避免一切政体都会遇到的争论、抵制和意外结局。实际上，从一种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被设想成一个把决策权分散到大多数公共领域中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政治制度**能保护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们的要求、调解它们的冲突和对抗时，才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反的，“公民社会”里的许许多多公共领域（例如工人委员、独立的保健中心、住房合作社和传播媒介）可以保持有效地检查和监督它们的政治代表的权力；这些政治权威反过来又会严格地为它们的管理活动向独立自主的公众负责。

应该强调的是，指导本书这些论文的三个论点——断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官僚主义的秩序，其瓦解和非政治化作用不断地刺激对立的公共领域的发展——具有一种典型理想的和很不成熟的性质。这些论点显然引起了许多问题，它们的术语和涵义并没有完全得到充分的解释或透彻的研究。正因为有这些空白，所以本书用一系列衔接的论文来介绍这些论点。这些论文的不完整和不连续可以提醒大家，这些有关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著作不能说已经提供了肯定的和毫不含糊的知识。这里所介绍的论点容许官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它们不接受试图把握住当前的“真实情况”以便选定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能够在技术上加以控制的对象。这里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宁可采取鼓吹者的姿态：它们临时提出的主张应该被理解为引玉之砖和进一步论证当前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民主可能性的各种发展的号召。

论 文 一

官僚主义及其不满：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

设想公共生活——我们对此知之甚少——需要有一种几乎是孩子似的万能的感觉。

亚历山大·克鲁奇

公共生活和危机

几年前，奥斯卡·尼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奇就提出过这样的论点：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通常是在以战争、投降、革命和反革命为标志的充满危机的历史阶段发展和兴旺起来的。由于一切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被一系列新的困境所折磨这个事实，所以这个论点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相当明显，这些困境已经引起了新的困难的选择、政治上的争论和社会斗争。这些争论和冲突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促使危机的形象扩散。因此，评论家们都异口同声地断言，一切经验的迹象都证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使人感到迷惑的是，危机竟意味着无数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且暂时把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危机可以出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里：从国际事务和种族关系的舞台到经济和最隐私的个人生活。**危机**已经变成头版新闻——官方言论和日常谈话用词中的一个基本单词。

这种危机形象的扩散是不能被当作统治集团进行欺骗的结果来消除的。当然，关于危机必然性的轻率论说很容易变成大公司和国家行政官员手中的宝贵材料——但是这几乎和任何其他方面的常识及民众的幻想没有什么区别。必须强调的是，对危机的广泛谈论也包含着一种解放或空想的意思。这种谈论是思想上的，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隐喻：危机形象的轻率扩散既妨碍批判地、解释性地说明“客观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过程，又使人想起（从前也许被掩盖着）这些过程中的矛盾和中断——这些中断扩大了拒绝和主观地干预旧秩序的可能性。可以说，关于危机的种种讨论象一组复杂的叙述那样起作用，通过这些讨论，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既掩盖自己又暴露自己。而这些叙述又象一种物质力量那样起作用，影响它们所表达和宣布的这种制度。总之，紧张、冲突和灾难等形象的扩散通常有助于打破这些幼稚而乐观的信念：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谈到危机就必然要谈到社会和政治形态，这些形态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很容易引起恐慌和失望——同时也引起争取一个不同的、也许比较好的世界的希望和斗争。

在这些推论之后，必须进一步全面研究尼格特和克卢奇的提法，即涉及公共生活和危机的各种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实际上，他们的提法从一开始就只有通过仔细地重新考虑比较传统的危机概念的涵义才能讲得通。和现在随意提到的危机截然相反，这种传统的危机概念本身有两个互相关联和非常明确的主题，一种关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理论不能忽视这两个主题。首先，按照传统的概念，一个受危机威胁的过程是它的生命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是它的再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的转折点。甚至在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的日常主观性遭到损害的地方，也会达到这

个转折点。危机过程背着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情地和“客观地”展开，好象有它自己的生命。把它们看作理所当然和天生的态度会改变，它们正常的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至少暂时会瘫痪。

这种综合症在这个概念最初的医学涵义中讲得很清楚。例如，歌德的著名问题“一切变迁都是危机；危机*难道不是一种疾病？”只不过是重新提出古代希腊医生的一个共同课题。按照希波克拉底的见解，危机发生在疾病加剧、转变成其他疾病或完全好转的时候。在修昔底斯的著作中，这种理解的广泛影响十分明显。他对科孚岛革命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雅典流行了七八天的致命的瘟疫危机的著名述评，使人想到一种客观的、似乎是有传染性的过程，这种过程在病人身上引起种种症状，他的个性被打乱，他的正常活动能力被剥夺。在20世纪，这种涵义重新出现在葛兰西关于20年代的意大利的反省中：“危机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还不能诞生；在这个间歇中，出现许多种类的恶性症状。”

然而，危机并非都是致命的、恶性的和“客观的”过程。卢卡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以及（再举一个例子）库恩关于推翻和改变科学论述的分析，都正确地强调，危机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破坏和建设、令人不安的反常状态和干预旧的正常状态的过程。传统的危机概念包含第二种涵义，这种涵义在医学上的应用是含蓄的：危机的种种倾向——打断一个过程迄今一直存在的、人人都知道的连续性——都相当于Dämmerung（黄昏或破晓）。这些倾向预示一个再生产阶段的结束和恢复再生产或向新的、不熟悉的再生产突破的可能性。谈到充满危机的社会过程，这是指，那些已经成为系统瘫痪的人的正常态度的蜕变，既有利于扩大对这种客观瘫痪的认识，也有利于积极地克服这种瘫痪的种种尝试。危机的辩证的不连续性倾向于产生它自身的“另一面”，

* 危机一词在医学上指病情或好转或恶化的转变期。——译者